

布拉格反抗精神與集體記憶

——以揚·帕拉赫自焚事件影片為例

謝欣初、鄭得興

布拉格之春到燃燒的1969年

1968年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上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在不放棄社會主義路線下，亞歷山大·杜布切克計畫帶領捷克斯洛伐克走向一條「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路線，於政治、經濟、科學與教育、以及外交各項政策進行自由化的改革，「杜布切克的基本主張是走一條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宣布：『我們要建立一種民主的、適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社會主義社會新模式…現在我們的任務是在未知的條件下開闢和實驗新的道路，賦予社會主義發展以新的性質。』這條道路的核心在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指導下的自由思想，實行真正的經濟改革。」¹然而這條道路卻讓蘇聯共產政權備受威脅，為避免共產政權基礎在中東歐各國有所鬆動，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於1968年8月20日深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開進布拉格城市內，進行全面鎮壓，杜布切克所領導的改革宣告失敗，他於隔年1969年的4月17日被迫辭職。此段捷克斯洛伐克曾經在共產政權下推動改革，後遭受蘇聯政壓的事件，被稱為「布拉格之春」。

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隔年（1969年）1月16日，一名就讀布拉格查理大學的大學生揚·帕拉赫（Jan Palach, 1948-1969）在捷克布拉格著名的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點火自焚，以表達

對於蘇聯紅軍鎮壓布拉格的反抗，他在案發現場留下遺書。其中主要有兩個訴求：首先是針對共產當局，要求立即終止檢察制度，第二是禁止親共的報紙Zpravy，並宣稱若是在五日內，這兩項訴求沒有被實現，人民沒有訴諸全面罷工來反抗，將會有更多的「火炬」（人）燃起（自焚），這封遺書意味著他的自焚行為可能並非個人行為，而是組織行動，此舉震驚國內外，相關報導與廣播隨即流出，捷克的青年也立即在揚·帕拉赫自焚後的兩日後，1月18日於國家博物館前進行為期四天的絕食抗議，1月20日，揚·帕拉赫死亡的次日，全國並舉行大型的悼念遊行儀式，數萬民眾上街參與，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活動都是由大學生組織籌辦的。共產當局對此事件的回應是在揚·帕拉赫死亡後的第四日，1月23日，蘇共中央總書記Leonid Ilyich Brezhnev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寫信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共黨同志，表達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局勢的關切，並聲稱揚·帕拉赫是「煽動者的犧牲品」。²

包含揚·帕拉赫自焚事件（表一），據捷克警方當局統計，從1月16日到1月31日，在波西米亞、摩拉維亞、以及西利西亞地區，總共列舉有十起自焚事件，不幸死亡的人有兩名，分別是揚·帕拉赫和Josef Hlavatý。另外，根據Milan Černý取得的警方資料統計研究發現，從1969年的一月到四月間，捷克斯洛伐克總共有29起自焚事件，其中只有三名是可以確定因利他主義和政治動機而自焚的，分別是揚·帕拉赫、Jan Zajic和Evžen Plocek³。目前可以確

定是追隨揚·帕拉赫而自焚的有五名，但這些人分散各地（表二），並非像揚·帕拉赫遺書內所言，有出自同一個組織的跡象。該組織是否存在過，至今仍無法被證實。然而，揚·帕拉赫卻不是布拉格之春發生後的第一位自焚者，早在1968年9月8日，波蘭的一名59歲普通職員Ryszard Siwiec，就在華沙體育館十週年上自焚，以表達對於波蘭軍隊參與布拉格之春鎮壓的不滿。事件持續延燒到1969年，那是燃燒的一年，對於自焚行動的意義闡述開始在各

方發酵，揚·帕拉赫成為捷克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時也是代表捷克民族精神凝聚的重要一刻。Coilin O'Connor在2009年的一篇評論報導裡採訪到1969年曾參與揚·帕拉赫死後街頭悼念、同時也是揚·帕拉赫的故人Jiří Návratil，他表示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件，是民族團結的重要時刻，在他有生以來，只有兩到三次，曾看過人民是如此的同心一致⁴，那燃燒的一年，也成為捷克歷史集體記憶的一環，不斷的被新世代所記憶和論述。

表一、揚·帕拉赫（Jan Palach）自焚事件年表⁵

年份／時間	事件
1948/08/11	出生位於Londýnská街道上的布拉格醫院
1954/09/01	開始在Všetaty就讀小學
1962/01/03	父親Josef死於Brandýs的醫院
1963/09/01	開始在Mělník就讀中等普通學校
1966/06	通過中等畢業考試並錄取布拉格經濟大學（University of Economics）
1967/06/26	前往蘇聯（Soviet Union）數週
1968/03	共同創立布拉格經濟大學學生會
1968/06/30	前往列寧格勒（Leningrad）地區工作數週
1968/08/17	從蘇聯返家
1968/08/21	（布拉格之春）佔領的第一天，從Všetaty（家鄉）到布拉格參加街頭示威活動
1968/10/01	第一次前往西歐國家，在法國從事季節性工作
1968/10/19	從法國返家
1968/10	開始在布拉格就讀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藝術學院哲學系
1968/10/28	拜訪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在Lány的墳墓
1968/11/07	在布拉格參與反抗蘇聯紅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街頭抗爭活動
1968/11/18-21	罷課佔領查理大學
1968/12/06	通過最後一次大學考試
1968/12/24	在Všetaty參加聖彼得和聖保羅羅馬天主教會的子夜彌撒
1968/12/25	在Libiš參加福音教會的服侍
1969/01/06	寫信給學生領袖Lubomír Holeček，建議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廣播電台的大樓，以放送總罷工的訴求
1969/01/15	在Libiš出席叔叔Ferdinand Kostomlatský的喪禮
1969/01/16 約6:00 a.m.	從Všetaty搭火車前往布拉格
1969/01/16 約8:00 a.m.	到達Spořilov住所大廳，起草了四份不同版本的遺書，署名「火炬一號」（Torch No. 1）
1969/01/16 約11:00 a.m.	離開住所大廳，買了郵票和明信片，與三封遺書一起寄出去
1969/01/16 約11:00-12:30 a.m.	在Poříčí 22街買了兩個塑料罐，並在Opletalova 9街裝滿汽油，前往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
1969/01/16 約2:25 p.m.	抵達國家博物館附近的噴水池，淋上汽油自焚
1969/01/16 約2:45 p.m.	內政部的救護車將之送往Legerova街上的整容外科手術專門診所

年份／時間	事件
1969/01/17 約10:30-11:00 a.m.	哥哥和母親探視
1969/01/17 早上	心理醫生ZdenkaKmuníčková錄製專訪
1969/01/19	友人Eva Bednářiková與大學活動份子Lubomír Holeček探視，後來由Lubomír Holeček解釋揚·帕拉赫生前所說最後的話
1969/01/19 3:30 p.m.	死於Legerova街上的醫院

表二、追隨揚·帕拉赫自焚者

年份／時間	事件
1969/01/20	舉行揚·帕拉赫的公眾悼念儀式與遊行 Josef Hlavatý (25歲，藍領工人) 於Plzeň自焚，五日後死亡，他告訴醫生他是為了抗議蘇聯入侵而自焚
1969/01/22	Miroslav Malinka (藍領工人) 於Brno自焚，聲稱追隨揚·帕拉赫
1969/01/23	蘇共中央總書記Leonid Ilyich Brezhnev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寫信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共黨同志，表達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局勢的關切，並聲稱Jan Palach是「煽動者的犧牲品」
1969/01/25	揚·帕拉赫喪禮 Jan Zajíc (18歲，學生，在Šumperk就讀技術中等學校) 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39號房的走廊自焚，在還未引起注意時就當場身亡，人們只能透過報導和傳單才得知其自焚的消息
1969/01/26	Jan Bereš (16歲，學徒) 於Cheb自焚，聲稱追隨揚·帕拉赫
1969/02/04	Evžen Plocek (39歲，工具製造商，工聯主義者和改革共產主義者) 於Jihlava的中央廣場(今馬薩里克廣場) 自焚，為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最後一位倖存的火炬(自焚者)
1973/10/22	揚·帕拉赫在Olšany公墓的遺體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被挖出，隨後送往Strašnice火葬場焚燒
1974/03	揚·帕拉赫的骨灰盒放置於Všetaty的家庭墓園
1989/01/15-20	反政府示威遊行和民族遊行活動在Všetaty舉行，後被稱作「帕拉赫週」(Palach week)
1990/10/25	揚·帕拉赫的骨灰盒從Všetaty被送往Olšany公墓
1991/10/28	捷克斯洛伐克總統Václav Havel在悼念儀式上追贈揚·帕拉赫以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一等勳章，表揚其對民主和人權的傑出貢獻

歷史再現與集體記憶之關連

1969年揚·帕拉赫自焚事件至今已經過去47年，然而其自焚至今仍然使人們思考到一些關於歷史以及人類生活上根本的問題，人們從不同的觀點去解讀對於其自焚的意義，而他們的解釋也正反映了他們當時所處的社會是如何影響他們的觀點。這種透過當代社會的不斷論述、使歷史不斷再現，而產生的集體記憶和認同，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指出的：「我們保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

通過一種連續的關係，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⁶。記憶從主體上來區分，人們除了自我身分認同和個體歷史維護的私人記憶，還包含有保證整個社會系統完整和連貫的公眾記憶，讓歷史和傳統不會隨時間流逝，而得以成為未來的借鑑和文化遺產⁷。哈布瓦赫進一步指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⁸具體來說，哈布瓦赫認為個體都活在既存的一個社會框架之中，透過群體和社會，個體才得以進行記憶的獲得和再建構，而這也是集體記憶形成和建構的原型。但必須注意到的是，「集體框架是承載個體記

憶的工具，但集體記憶並不等於個體記憶的總合。準確地說，集體框架對個體記憶具有「合力式」的統攝作用。個體是通過把自身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的，而群體記憶又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⁹如此，我們便清楚了解到了集體記憶的建構特性，以及其隨著不同的社會框架而會形成不同的集體記憶論述，因此，揚·帕拉赫自焚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框架下，和如今捷克的社會框架下的論述也必截然不同，究竟誰的論述更能重現歷史，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歷史再現的特性上做進一步的釐清。

根據凱斯·詹金斯（Kieth Jenkins）《歷史的再思考》中對於歷史再現的重新思考與論述，首先必須釐清的是「歷史」和「過去」的區別，「歷史」其實包含了「對於過去的書寫和記錄」以及「過去本身」。因此歷史是論述過去，卻絕對不等於過去，史學家常用的「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一辭雖代表歷史，卻也並非直接指向過去本身，而是史學家對於過去所做的書寫和記錄¹⁰。因此，在這裡我們理解了歷史並非過去的全貌，而是經過史學家取舍記錄下來的，而我們所理解的歷史，也多是習得的而非親身經歷的，歷史和過去隔著遙遠的時空距離，因此，「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在此便凸顯了出來，記憶可以用來填補歷史的遺漏，並且記憶本身必須透過在集體框架中的不斷解構和再建構，才能持續更新和產生新的意義，並因此使人們定位自身與社會的認同，與歷史空間產生關聯，而這也是本文認為歷史記憶對於當下生活的人們所產生的意義所在。

記錄片敘事觀點之詮釋

紀錄片的精神最早被認為是來自俄國維托夫（Dziga Vertov）¹¹在1920年代末提出的電影眼

（Kino-Eye）理論，他認為電影攝影機能帶來新的觀看方式，是比人眼還要更科學的一大進步，「透過電影手法『征服空間，用影像聯繫整個世界的人…同時也征服時間，藉以發現真實——其概念源自電影最早的使用方式。』」而他的這個概念也代表了電影做為一種「記錄與再製」機制的早期主張，無聲電影在蘇維埃革命後扮演著很重要的新聞傳布的角色。¹²然而，維多夫的這項理論應用多是放於新聞片的製作中，強調以「不表演」的方式呈現日常生活真實面，1890年盧米耶兄弟運用相同的概念游走各地，將各地的影片剪接在一起放映，並使入鏡的群眾能一同觀看，被稱為是新聞片與紀錄片之父，同時也是互動觀影的先驅，使影像和真實經歷同時存在一刻，率先實踐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精神。¹³

紀錄片的一項技術上的重大變革是1950年代同步收音影片的出現，電影正式從默片進入了有聲電影的時代，而隨著這項變革，紀錄片也發展出了兩種不同的製作理念——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與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直接電影延續維多夫的眼睛概念，強調攝影者不可對於拍攝對象進行干擾，盡可能捕捉真實事件的發生過程，然而，這樣的拍攝手法卻備受批評，認為幾乎是無法做到的，拍攝若非透過剪接，也會使內容顯得毫無意義，除此之外，「評論界對直接電影的批判重點之一是，直接電影缺乏社會脈絡的交代——將觀看過程自然化，以本雅明的話來說，就是缺乏『圖說』。」¹⁴與直接電影相對的真實電影，則是將拍攝者的角色界定為與被拍攝者一樣的參與者的角色，導演可以與被拍攝者互動，並且具有激發特定事件發生的能力。然而儘管這兩種拍攝手法都傾向使真實渾然天成的重現，不像劇情片於事前撰寫劇本，但是隨著拉美的「第三電影」的發展，將攝影器材直接交給被攝者，讓他們可以自己拍攝自己主

觀的作品，這種紀錄片主、客體的改變，使「電影自決」崛起，運用介入歷史的方式可以使從前被新聞片所摒除的對象再次重現，紀錄片與歷史之間的關連就此被呈現出來。¹⁵

當我們關注到歷史紀錄片的同時，除了對於歷史在電影中重現的真實與虛擬問題的研究範疇，本文更強調關注到歷史紀錄片中仲介的主體（意即紀錄片的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解讀，因為畢竟紀錄片不可能包含全部的歷史，如同比爾·尼克斯所說：「歷史總是被指涉，但永遠不會被捕捉，它超越所有想包含它的規則，不斷和這些規則對抗、競爭，進而加以拒絕。」歷史在依附及拒絕電影的形式中，為觀影方式預留了空間。¹⁶因此，當紀錄片企圖去涵蓋或重現一段歷史時，其實就是一個政治主體建構的過程，而觀眾在解讀並賦予電影意義的同時，更體現了解讀即建構的意涵¹⁷，這在波登（Julianne Burton）所列舉的紀錄片再現真實的四種模式當中，屬於反身自省（reflexive）模式，意即重視到攝影者、被攝影者、以及觀者三種關係的位置，尤其是強調觀眾能以自覺的態度探索事件的「真實」，而非一味接受作品所呈現的「真實」¹⁸。而這樣的觀點正好符合高達瑪所提出的詮釋學的理论觀點，他同樣認為主體在解讀文本的同時，不只是理解，還是一種再創造的生產過程，而「因為我們的意識是由歷史演變所決定的。一個人的當下和歷史因素會恆久不變地進入到解釋活動中去，並影響到理解的本身。」因此這就是高達瑪所提出的觀者的偏見，他認為這樣的偏見是有合理性的，而正是這種偏見，使觀者在理解本身，能將當下和過去兩種視界融合交織在一起，達成高達瑪所提出的「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diffusion of horizon）¹⁹，本文認為視界融合的意義也就是觀者透過紀錄片理解歷史記憶中，對於當下人們生活的意義所在，因為「歷史紀錄片不僅告訴我

們過去的事，還要求我們採取一些行動——如同歷史天使般，透過過去救贖現在」²⁰，正是這種人們透過理解、建構而產生的能動性，能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力量，並代表著紀錄片的社會實踐。

《燃燒布拉格之春》詮釋觀點

本文的研究問題意識在於紀錄片重現的歷史記憶對當下人們生活有何意義，以下本文將進入分析的主體，以2013年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所執導的劇情紀錄片《燃燒布拉格之春》為分析文本，分三點說明探討這部紀錄片如何詮釋布拉格的反抗精神以及集體記憶之意涵。

一、意象——燃燒的身體

這部紀錄片所論述的歷史記憶，正如第一節歷史背景裡所揭示的，是以揚·帕拉赫自焚作為開頭，但是意外的是，他的自焚並不是紀錄片追逐的主線，甚至揚·帕拉赫在三天後就死亡了，他的自焚所帶出的是一個燃燒的身體意象，代表著那燃燒的1969年所消失的記憶，這個意象成功訴諸了觀者的感情訴求，挑起了觀者重造歷史的欲望。揚·帕拉赫為什麼要自焚？他向社會表達什麼？他死前最後說的話到底是什麼？這些都使觀者不自決的設身處地，變成了死者的現代化身，比爾·尼克斯說：「紀錄片呈現的身體必須置於歷史脈絡的關係中來理解，歷史脈絡乃是一種參考，而非本體論。歷史是痛苦與死亡發生的地方，卻也是事實與事件產生意義的地方。」²¹而這正是本文所說觀者理解歷史，同時也創造記憶的第一步，使觀者藉著接下來紀錄片所鋪陳的圖說，進一步的去挖掘紀錄片所想要傳達的歷史意涵，並使觀者與這樣的歷史記憶產生關連，我們可以將這樣的

燃燒的身體意象理解為布拉格的反抗精神，但是這個反抗精神是鑲嵌在那燃燒的1969年的歷史記憶脈絡之上的。否則，死亡的身體一旦脫離與歷史脈絡的關連，便會變得毫無意義。

二、線索——遺書

揚·帕拉赫自焚後，隨即於三天內就死亡了，他留下來的唯一線索，也是紀錄片留給觀者的線索，便是遺留在案發現場的那封遺書，警察循線不斷的在探察其遺書裡所提到的組織是否存在，以避免下一個自焚事件的發生。於此同時，社會裡各方的聲音也蠢蠢欲動了起來，校園裡學生的聲援運動、家長的人心惶惶、知識份子圈裡，律師、教授、醫生的觀望，以及揚·帕拉赫所反的權威——共黨政府的緊張情緒，全部都抓著這一根沒有解答的線索前進，而這條線索在第二個燃燒的身體（Jan Zajic的自焚）的出現後，似乎就斷了線，銜接到了另一個真相還原的主線上，你可能會問，那這樣這封遺書的線索有甚麼意義？又或者將這封遺書解釋為只是紀錄片敘事的一環，然而，其實更重要的是：「閱讀欠缺的、遺留的和補充的，歷史學家和紀錄片導演遂成了解構者，他們拆解欠缺的歷史紀錄，並在此過程中重建新的歷史敘事。」²²因此，正是因為這封遺書留下的種種疑點和留白的解答，才更能增加紀錄片在歷史記憶重構中以各種可能性和各方的觀點去凸顯其意義。

三、真相——權力話語權

最後回到紀錄片解構真相的主線，來自一條揚·帕拉赫的母親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員Vilém Nový提出的誹謗訴訟，針對Vilém Nový於1969年1月20日在Česká Lípa舉行的黨員和選民會議上，他聲稱揚·帕拉赫的自焚一開始只是要點燃一種不會對身體造成傷害的冷火（cold fire）來引起注意，

卻被掉包成了易燃汽油，最後引火自焚，硬生生的在一個死亡的青年頭上落下了欺騙的罪名。揚·帕拉赫母親的委任律師Dr. Dagmar Buresova在尋案調查、蒐集證據的過程中，遭到秘密警察的跟蹤壓力，凸顯共黨社會中威權壓迫的緊張氛圍，最後在物證、人證不足下，這場訴訟以敗訴收場，揭示了歷史記憶建構中權力意識形態的支配權。

「在當代的局勢裡，歷史記憶絕不僅僅是一個『場所』而已（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語），更是一系列社會／國家、有權／無權、上層人士／底層人士之間界線分配的操弄對象。」²³這個訴訟結果在當時只能有一個真相，然而隨著社會框架的改變，真相有了另一個伸張的空間，意即當我們在省視歷史記憶的重新建構中，不可忽略的權力的支配性，儘管在片尾如我們所熟知的歷史發展，在當時沒被伸張的正義，有了光明的曙光。然而，其所揭示的是歷史記憶再建構所帶來改變的力量，如同歷史的天使一般，以現在救贖了過去。

結語

1989年揚·帕拉赫的紀念日當天，捷克斯洛伐克舉行了大型的紀念遊行，十個月後，共產黨宣告垮台，捷克斯洛伐克獲得自由，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悼念儀式上追贈揚·帕拉赫以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一等勳章，以表揚其對民主和人權的傑出貢獻。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曾在其著作《布拉格精神》中提到：「但是我覺得，對布拉格的外貌和精神影響最大的並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奴役的生活，無數恥辱的失敗和殘酷的軍事占領。」²⁴正是這股不自由，促成了布拉格的反抗精神，以揚·帕拉赫燃燒的身體作為代表，死亡和痛苦因為歷史集體記憶的重新

建構更深具意義，並在20年後的1989年帶來國家改革的力量，而在又過了20年後的2013年，捷克改革為人民直選的這一年，《燃燒布拉格之春》這部紀錄片被拍攝出來，再次迫使捷克人去思考和面對對於歷史真相的欲望，因為「我們建構歷史敘事的共犯性，我們對歷史現狀的投注；它凸顯了我們作為歷史仲介的主體的地位：觀看和聆聽也是歷史活動。」²⁵面對紀錄片所解構的歷史的同時，我們透過瑣碎的語言和畫面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的藍圖，然而我們也不可以忘記，攝影機同時也是一種武器，為權威發聲。

法國學者Aain Brossat將當權者對記憶的遺忘歸咎於道德問題，認為那是國家罪行的延長，並且將集體記憶放到治理的範疇裡做理解，集體記憶的利用並不是為了還原真相，而是在現行的權力框架下，增加可利用的價值，這樣的例子特別是在現在的西歐國家，處處可以找到抹滅屠殺、抹滅殖民而達到如愛國情操般的例子²⁶，從此我們便可以清楚的看到集體記憶如刀刃的一體兩面，一面是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和民主深化中重要的記憶建構，一面則是當權者所操控的權力建構，在捷克的例子裡，我們看到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絲絨分裂」後，捷克的轉型正義仍然持續的在推動中，不僅是對於過去不法不義作為的處置，還包括對於歷史記憶的重新建構²⁷，正向的成為文化以及民主深化的一劑強心針。在揚·帕拉赫所就讀的查理大學藝術學院，2007年由學生會發起了一項多媒體計畫（Multimedia Project），將揚·帕拉赫個人生平、自焚始末，以及在1969年的歷史檔案資料做了完整的文字和圖片的呈現，分別於2009年出版了書籍〈Jan Palach' 69〉，並架設了janpalach.cz / janpalach.eu網站和舉行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另外還在布拉格查理大學以及斯洛伐克位於Bratislava的國家博物館舉行展覽²⁸，可以看出積極推廣集體記憶的重

建和教育不遺餘力，筆者認為紀錄片所呈現的痛苦歷史記憶，並不是要我們掩面哭喊著：「真可怕！」，而是在我們掩面哭泣後還能擁有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如同揚·帕拉赫的母親在紀錄片中所說的：「唯一能安慰我悲痛的是我的兒子為了自由、國家和真相而犧牲，我相信他的犧牲將不會被遺忘。」²⁹這樣的精神果真是真真實實活在了捷克人的心中，而且會一直傳承下去。

（本文作者謝欣初為東吳大學社會所碩士生，獲得2016年捷克政府獎學金赴捷克留學一年；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

參考文獻

- 吳曉春，2012，〈杜布切克“布拉格之春”改革思想初探〉。《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 79-82。
- 趙靜蓉，2009，〈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浪漫主義——對浪漫主義的文學人類學解讀〉。《南京師大學報》(5): 137-142。
- 盧非易，1998，〈紀錄片的再現技術與觀念之轉變〉。《傳播研究簡訊》(14): 14-16。
- 鄭得興，2014，〈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2): 63-81。
- Brossat, Alain著、邱德亮譯，2008，〈介於抵抗與治理性之間的集體記憶〉。《文化研究》(6): 244-253。
- Jenkins, Keith著、賈士衡譯，2009，《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
- Klíma, Ivan著、景黎明、景凱旋譯，2003，《布拉格精神》。台北：時報文化。
- Rabinowitz, Paula著、游惠貞譯，2000，《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台北：遠流。

- Halbwachs, Maurice著、畢然、郭金華譯，2002，
《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
<http://chianweilee.blogspot.tw/2010/02/hermeneutics-hermeneutichermesologytic.html> (Date visited: Apr 05, 2016).
- <http://www.janpalach.cz/en/> (Date visited: Apr 03, 2016).
- <http://www.radio.cz/en/section/czechs/jan-palach-the-student-whose-self-immolation-still-haunts-czechs-today> (Date visited: Apr 03, 2016).

註釋：

1. 吳曉春：《杜布切克“布拉格之春”改革思想初探》，載《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2. Jan Palach-Charles University Multimedia Project, at <http://www.janpalach.cz/en/>, Apr. 03, 2016.
3. Jan Palach-Charles University Multimedia Project, at <http://www.janpalach.cz/en/>, Apr. 03, 2016.
4. Radio Praha, at <http://www.radio.cz/en/section/czechs/jan-palach-the-student-whose-self-immolation-still-haunts-czechs-today>, Apr. 03, 2016.
5. 作者自製年表，參考資料翻譯自Jan Palach-Charles University Multimedia Project, at <http://www.janpalach.cz/en/>, Apr. 03, 2016.
6.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
7. 趙靜蓉：〈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浪漫主義——對浪漫主義的文學人類學解讀〉，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8.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頁。
9. 趙靜蓉：〈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浪漫主義——對浪漫主義的文學人類學解讀〉，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 10.[英]凱斯·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麥田出版2009年版，第84-85頁。
11. 季嘉·維爾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本名大衛·阿別列維奇·考夫曼（Давид Абелевич Кауфман），是20年代末的早期紀錄片電影製作先驅，發起著名的「電影眼（kinoks, or kinokis）」理論，同時也是一名詩人與電影剪接師，他身處俄國共產革命，製作在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教育性新聞片。他強烈地相信由攝影機捕捉而來的真實生活與它保有的時代精神深具價值，他憎惡中產布爾喬亞電影中以風格化及人工化的虛構方式來呈現生活。（引自[美]Rabiger, Micheal：《製作紀錄片》，王雅維譯，遠流出版1998年版，第34頁。）
- 12.[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38頁。
- 13.[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39頁。
- 14.[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41頁。
- 15.[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42-43頁。
- 16.[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44頁。
- 17.[美]Bordwell, David：《電影意義的追尋——電影解讀手法的剖析與反思》，游惠貞、李顯立譯，遠流出版1994年版，第26頁。
18. 盧非易：〈紀錄片的再現技術與觀念之轉變〉，載《傳播研究簡訊》1998年第14期。
19. 李建緯：〈詮釋學與接受美學：高達瑪與伊瑟〉，資料來源：<http://chianweilee.blogspot.tw/2010/02/hermeneutics-hermeneutichermesologytic.html>（存取時間：2016年04月05日）。
- 20.[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48頁。
- 21.[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41頁。
- 22.[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52頁。
- 23.[法]Brossat, Aain：〈介於抵抗與治理性之間的集體記憶〉，邱德亮譯，載《文化研究》2008年第6期。
- 24.[捷]Klima, Ivan：《布拉格精神》景黎明、景凱旋譯，時報出版2003年版，第46頁。
- 25.[美]Rabinowitz, Paula：《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游惠貞譯，遠流出版2000年版，第56頁。
- 26.[法]Brossat, Aain：〈介於抵抗與治理性之間的集體記憶〉，邱德亮譯，載《文化研究》2008年第6期。
27. 鄭得興：〈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載《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
28. Jan Palach-Charles University Multimedia Project, at <http://www.janpalach.cz/en/>, Apr. 06, 2016.
29. 翻譯自《燃燒布拉格》紀錄片中，揚·帕拉赫母親之言